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通往经世济民之路

——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

(1898—1949)

孙家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通往经世济民之路

——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 (1898—1949)

孙家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孙家红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ISBN 978-7-301-20085-8

I. ①通… II. ①孙… III. 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校史—1898—1949 IV. ①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7008号

书 名：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

著作责任者：孙家红 著

责任编辑：郝小楠 冯天骄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085-8/F·3026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cm@pup.cn

印刷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mm×1020mm 16开本 14.5印张 243千字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献给
全体北大经济学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

编委会

名誉主编：刘 伟

主 编：孙祁祥 章 政

编 委：（按照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崔建华 董志勇 何小锋 林双林 平新乔

宋 敏 王曙光 王跃生 肖治合 叶静怡

张 辉 张洪峰 郑 伟

总序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一名《原富》），标志着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此后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传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至1931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启修教授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大经济系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拥有深远历史渊源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一个多世纪中涌现出马寅初、陈岱孙、赵迺抃、樊弘、陈振汉、胡代光、赵靖、厉以宁等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2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已走过了110周年历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也迎来100周年的隆重庆典。为了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建立110周年，我院编写了这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经济学科，它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

奠定了百年北大的精神基调。今天，我们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也要秉承兼容并包的创新精神，在继承北京大学经济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吸纳世界前沿的经济学成果，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经济学人应有的贡献。

孙祁祥

2012年1月15日

序言一

孙家红同志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法学院，获得历史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北大的学术熏陶和他自身的不断努力，使他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良好的学风，并已在相关专业领域崭露头角。2005年前后，我读到 he 撰写的一篇周炳琳教授的传记（《书生意气 赤子情怀——周炳琳先生传略》），感觉文笔生动，资料翔实，在周炳琳教授的生平研究和思想评论方面有很大突破。从此，这个年轻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近几年，他又对周炳琳教授相关资料广泛搜罗，不时会有一些新的收获。我也经常会将手中掌握的资料或者新写的文章送给他，供他研究参考。

2008年夏，孙家红同志在北大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到北大经济学院做博士后研究。起初，他来和我商量，计划为周炳琳教授撰写一部完整的学术评传，想通过周炳琳教授的生平际遇、思想历程，透视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贡献。后来，院里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撰写一本经济学院的院史，孙家红同志因为此前进行过相关研究，便以这个新题目做他的博士后论文。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关于周炳琳教授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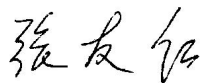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孙家红同志的博士后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不仅开宗明义，指出了经济学科史的学术价值，并与以往一些专业史撰写者单纯叙事的方式有所不同，他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教员、学生和课程设置”应是我们科学认识和评价经济学科史发展阶段的重要依据，堪为将来其他专业研究撰写学科史时参考借鉴。

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言，由于种种原因，在此之前尚无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史的专著。而在这本博士后论文中，孙家红同志以较为宏观的历史视角，从中国近代商学和“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到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育规划，从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再到抗战前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考察。因此，可以说，这本书不仅是第一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史，更因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的连续性、典型性，使本书也成为第一部中国近代经济学科史方面的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对于北大经济学科发展史的叙述和讨论，建立在大量原始材料基础上，涉及人物、史事众多，显示了孙家红同志较强的史料驾驭能力。尤为难得的是，全书

采用文字和图片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文字颇为精彩，而且所附图片多属难得一见，可以使读者在阅读文字时，顺便浏览历史的风景。其中一些文字和老照片，与我还有直接的关联：有的载有我的名字，有的包含我本人的影像，有的更是我亲自拍摄而成（如1949年3月18日马寅初老师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北大经济系主任赵迺抃教授三人在北大北楼的合影）。每当阅读到这些地方，总使我产生不少联想，想念那些曾经逝去的岁月、昔日的师友，以及生活中的点滴故事。虽然过去的人和事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但越是久远，越能显示出历史的魅力。

孙家红同志的博士后论文即将出版，他希望我给他写一篇序言，我作为合作导师，自然不容推却。对于本书的学术质量，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评判。在此，我对他表示祝贺，祝贺他在学术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份收获。同时，希望他能戒骄戒躁，不断进取，争取学术上有长足的进步，也希望他能将周炳琳的研究继续下去，使撰写周炳琳评传的计划早日实现。



2011年12月27日

02 序言二

《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1898—1949）》是孙家红作为博士后的研究报告，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付梓之际邀我作序。很高兴能为家红的这一著述作序，也非常感谢家红为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来谈谈我对北大经济学科史研究的态度。

我是七七级考入北大经济系的，入大学前，不知道大学里设有经济系科，或者是我本人知识匮乏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的确没有受到很专门的中学教育，至少我是支离破碎地读完所谓的中学的；或者也还由于那个年代历史的原因，以所谓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忽视经济和蔑视经济学是不难理解的。因此，虽然我知道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课程，但并不知道大学设有经济系科，以至于我接到北大经济系录取通知书时，激动之余充满茫然，不知道我要进入的经济系要学些什么。1978年春进入北大经济系后至今，我就再未离开，北大经济系（1985年后改为经济学院）教给我太多，使我这个不知经济学要学什么的年轻人，先后在此获得了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直到今天一直在这里读书、写书、教书，我对北大经济系（学院）感情太深，特别是自1993年起至2002年近十年我任经济学院副院长，自2002年至2010年我任北大副校长之前，又任两届经济学院院长，我对北大经济学院更多了一份责任，我爱她，爱这里的师生；敬畏她，敬畏她的历史和庄严；我从心底为她祈祷，企盼她更强大、更美好。所以，很久以来，就有一个愿望，想组织力量把北大经济学科史作一系统科学的研究，展示给人们。当然，这种愿望的产生绝不仅仅是出于个人对经济学院的感情，更是经济学科史，尤其是北大经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因而，在2008年年初经济学院制订博士后研究项目计划时，我作为时任院长便提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研究”这样一个题目，恰好家红以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厚兴趣和精心准备，以他对这一问题的独特理解和驾驭能力，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在当年只有一个博士后国家拨款名额的情况下，通过了考核，并于2008年秋进站开始展开研究，历时两年多，完成了这项工作。说实话，以两年时间做一个学校中一个学科发展史的研究，说短可不短，特别是在学术空气开始浮躁的氛围中，花两年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真的不算短，甚至可以称为“专注”了；但说长也不算长，以北大经济学科至今110年的历史（1902年开设），用两年时间研究她，真的不算长，甚至可以称为“浓缩”了。但无论时间上

的长短怎样，这部著作展示给大家的是作者的认真和功力，这就值得尊重。

当然，既然是反映北大经济学科发展史，虽以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为主要内容，事实上，北大经济学科的演进也是以经济学系及后来改为经济学院的发展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历史线索的。但是，这一研究不能限于经济学院的学科范围，在北大历史上很多重要的经济学学术思想、学科课程的提出及建设，并不限于经济系的老师，如著名的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播者李大钊先生，又如在我国早期讲授《资本论》课程的陈启修先生等，都不是当时经济系的老师，但都对北大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于现在的北大经济学科更是精彩纷呈，除经济学院外，光华管理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政府管理学院等都有杰出的经济学学者和重要的经济学学科，这些或许今后再写新的跨度更大的北大经济学科发展史时，能够得到反映。家红的这部著作研究的时间是截止到1949年，而北大经济学科发展极具光彩的一段应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在教书育人上，还是在学术研究上，包括对国家发展的政策影响上，没有哪个30多年，能与北大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展相比。可能是对1949年以后的北大经济学学科史的研究条件尚不具备？也可能是这其中存在的历史争议尚难断是非？留待以后吧。

其实，研究学科史，当然首先是检讨过去，我们不能忘却过去，更不能割断历史，相信无论北大哪个学科史的检讨过程，都会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过程，因为北大的历史与国家近现代史的演变，北大的命运与民族近现代以来的命运，北大的学科与中国的科学发展，相互关系太密切，也太特殊，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这就使我们开展北大学科发展史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绝不仅仅是通过历史钩沉，以激励现在北大人的创造激情，北大是不缺激情的，正是所谓北大是常维新的，激情之下更需要的是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尊重高校建设规律，对于这种规律的认识当然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文明，但探讨历史，会给我们认识这种规律别样的清醒、别样的帮助。不仅北大的哲学人文社科学科的学科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北大的数学自然科学等学科史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据我所知，这方面工作在北大已经开始，哲学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学科史研究，学校社会科学部已经在相关院系领导会议上多次提出并倡导，相信会有各院系的反应并会有新的收获。家红的这部关于经济学科史的研究著作，尽管只写到1949年，但是一个重要的开启。在数学自然科学各学科史研究上，北大也已有很好的成果，曾任北大副校长

的沈克琦先生多年潜心北大物理学科史的研究，2010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他，获悉在北大物理学科设科9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已出版了一部，后又不断充实、修正，准备在北大物理学科百周年时推出新的北大物理学科史。真是可敬！

北京大学从京师大学堂算起至今已有114年了，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自开设起已有整整110年了，北大的许多学科都已超过或接近百年历史了，有能力也需要进行科学而又系统的认真回顾，进而指导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工作。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明确提出，是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时，由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先生代表国家首次提出的，对北京大学来说现在已到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也是攻坚时期。据国际有关机构所作的学科比较分析，五大类学科中（包括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工学与信息学科、医学学科等）北大自然科学学科已到世界第17位，人文学科列第18位，医学学科列第21位，社会科学学科列第24位，工学与信息学科列第34位。有关机构更进一步对全部22个具体学科的比较分析中，截至2011年北大已有17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前1%。这样看来，北大似乎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目标不太遥远了，北大也的确有信心再过不太久，比如再用10年左右时间真正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但这些所谓数字反映的排序只是说明了些许，并不反映根本，北大人自己清楚或应当清楚，北大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要通过对我们中国现代文明进展的真正贡献来证明的，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是要在当代世界科学和民主发展中显示引领性创造力才能被真正承认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上的位置变化（包括国际和国内的种种排序）能证明的，不仅仅是物质条件上的丰富和规模的扩张能支撑的，更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创造、一种超越。这是北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总是忘不掉当年的西南联大的原因，这种历史传承，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多宝贵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北大学科史研究的初衷。我们敬重北大的过去，无论她曾经怎样；我们相信北大的未来，无论她面临什么。

感谢也祝贺孙家红博士做出的这项研究工作。

刘伟

2012年2月24日

目 录

导 论 经济学科史的学术价值	1
一、司马迁伟大？还是汉武帝伟大？	1
二、如何书写经济学科发展史？	4
 第一章 风生水起：京师大学堂及早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1898—1911）	8
一、“经世”、经济与“商学”	8
二、富国策：京师同文馆的经济学课程	11
三、京师大学堂的经济学教育规划	17
1. 学科产生背景	17
2. 商学（经济学）课程设计	21
3. 译学馆、进士馆的经济学传习	30
附：北洋大学堂的经济学科	33
 第二章 吹皱春池：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12—1927）	37
一、《国富论》的最早翻译者——严复长校	37
二、蔡元培的经济学科规划	44
1. 归并商科	46
2. 学术分校	49
3. 裁科设系	50
4. 加强教学	53
5. 学术研究	57
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63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播	64
2. 学术组织和刊物	70

第三章 水涨船高：抗战前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28—1936）	78
一、短暂的“京师大学校”与复校	78
二、北大“中兴”时期的经济学科发展	82
1. 蒋梦麟长校	82
2. 欧美化的经济学科模式	85
3. 思想控制加强	96
三、周炳琳和赵迺抃的合作	99
四、危城中的坚守	116
第四章 滚滚东流：抗战时期及复校后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科（1937—1949）	120
一、从长沙临时大学到西南联合大学	120
二、弦歌不辍——教育史的奇迹	126
1. 教员与课程设置	126
2. 学生培养	133
3. 书生报国	137
附：伪国立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概况	146
1. 课程设置	147
2. 教员与研究	154
三、复校后的学科重整	158
1. “复神京，还燕碣”	158
2. 教学与学术研究	164
3. 历史的抉择	178
附 录	188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历届同学名录（1913—1949）	188
1910—1949年历任经济学系（经济门、商学门）监督、主任名录	203
主要征引文献	207
后 记	211

导 论

经济学科史的学术价值

一、司马迁伟大？还是汉武帝伟大？

试问：司马迁与汉武帝相比，谁更伟大？对于这样的问题，曾见网络上有一些人讨论过，讨论来讨论去，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归结起来，无外乎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司马迁更伟大。因为他撰写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名著《史记》，为当时以及后世留下了一部难得的“信史”。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影响，足以穿透几千年的中华历史，直到今天乃至未来，仍然熠熠生辉。相反，尽管汉武帝英明神武，宏谋远略，曾派人北击匈奴，“凿空”西域，不断地开疆拓土，奠定了西汉王朝的鼎盛局面；但其所为之事，无论在于制度还是文化创造上，皆难以超越其所处时代，多限于一朝一代，一时一世。尽管汉武帝作为中国古代难得的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借用今天的话说，他的功绩局限于其所在的“现世”或“当下”——尽管他执政的时间很长，而且是中国古代寿命最长的几个著名皇帝之一，但他的事功业绩很难达到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的历史穿透力。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汉武帝“功在当代”，而司马迁则是“功在千秋”。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汉武帝更伟大。因为，不管怎样，汉武帝毕竟是皇帝，而司马迁只不过是一介书生，虽操“董狐直笔”，却难逃“李陵狱案”之牵连，面对势力强大的皇帝，也只能忍受“腐刑”之辱。相反，汉武帝则倚仗其帝王之威，内兴盐铁之利，奖农抑商，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保持社会稳定，外拒强敌，扫平漠北，构建起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大业，汉武帝本人也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有作为的帝王之一。比较而言，汉武帝所行之事更能直接地影响社会以及民众的福祉，司马迁撰写《史记》不管怎样成功，也只能是文化或学术行为，现实或当下的影响究属有限。这样一种观点，虽难免有过于强调身份和功利之嫌，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以一时一地观之，生当汉武之世，司马迁自然没有汉武帝之伟力。第三种观点，则近乎调和或者折中，认为司马迁和汉武



帝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巨大成就，但他们的成就则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事业毕竟不同，很难作出上下高低之类的价值判断。

其实，笔者对于上述的比较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一方面，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很难作简单的比较，要想作出孰高孰低的判断也没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在历史的传承和延续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整理和书写十分必要。历史学家孟森曾经说过，史家有“传疑传信”之责，但关键在于“传信”。也曾有人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可是，不管历史这个“小姑娘”被人如何打扮，却总是先要有打扮的对象，才能被打扮出来。而后，历史学家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在被打扮的表象下，尽可能地探求历史这位“小姑娘”的本来面貌。因此说，史家的“传信”之责固然无比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身为史家，有责任将历史书写记录下来，留供后人阅读和了解。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要在研究的开头，谈到司马迁和汉武帝？为什么又谈到史家的责任？原因在于，笔者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或者说近现代以来——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似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我们所熟知或耳闻的“大师”级人物，往往大多出自文史哲专业，而出自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则比较少。就拿北大为例，文史哲专业可谓“大师辈出”，不胜枚举。而经济学呢？除了马寅初、赵迺抃、陈岱孙、李大钊、陈启修等人之外，诸如王建祖、朱锡龄、胡谦芝、顾孟余、秦瓚、周作仁、李浦、杨西孟、陈兆焜等等，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家来说，不仅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曾经在经济学领域有过哪些作为，恐怕连人名都比较陌生吧。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在经济学家中——即使像马寅初这样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很少被冠以“大师”的称谓。之所以如此，是出于经济学者们自身的谦虚和谨慎？还是由于专业的领域太窄，难与“大师”的称号相匹配？答案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远者且不讲，试看1949年后这六十多年，若以“事功”论，小到公司经营运作，大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调整，经济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社会财富，可能比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所创造和占有的总和还要多。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恐怕也是如此。不可否认，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相比，经济学家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更为直接的。这就产生一个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相比，谁更伟大”类似的问题：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相比，哪个更伟大？如果说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那为什么经济学界的人物很少被人记忆？为什么经济学界的“大师”会比较少？

对于第一问，与司马迁和汉武帝的问题很类似。其实，经济学家的贡献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们的贡献相比，也是难分高下的。以创造和占有财富的数量为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贡献高低，显然难以服人，甚至有点荒唐。社会不仅需要经济学家们贡献才智，追求福利的最大化（或“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更需要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们守护社会的良心。彼此之间，是不可截然割裂或者孤立存在的。第二问和第三问，其实关系到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大学制度产生较晚，经济学科也是如此，至今不过百余年时间。相形之下，文、史、哲专业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传承，远比经济学要早得多；而且文、史、哲专业即使在现代中国，其专业内容与中国传统的衔接远比经济学紧密。或者说，文、史、哲专业（尤其在关涉中国传统学术方面）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所承载的历史不过百余年。以百余年与几千年相较，淘沙见金，所能筛选出的杰出人物，多少之别自然明了。不仅如此，从“专业壁垒”（即专业的排他性）来看，从事经济学专业者，自可以同时爱好文、史、哲，阅读文、史、哲之类的作品，接受文、史、哲的专业熏陶，乃至进入文、史、哲领域，有所作为；但是，从事文、史、哲专业者，却由于专业限制，往往很难进入经济学领域——尤其核心和尖端领域。别说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来讨论问题，只是面对其中大量的数据，就已经令很多人头疼了。由此可见，经济学的“专业壁垒”是比较强的。但是，从事经济学专业者，也不必沾沾自喜。要知道：历史不仅是“人民”书写的，更多地是由历史学家们书写的！由于历史是历史学家们书写的，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往往难以跨越经济学的“专业壁垒”，因此，历史学家们在书写和记录历史时，往往对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的具体贡献知之甚少，也就难以下笔，有时竟“暂付阙如”了。那么，是不是可以由经济学者们来撰写本专业的历史？这就涉及了第二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学界历来缺乏对于本专业的学术清理。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或许在于：一方面，经济学的使命，用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经邦济世、经世济民。或者说，经济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当下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绝非历史的问题。即便涉及历史问题，也无非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的参考之用。对于“当下”的过分强调，则有可能陷入历史的虚无主义，缺乏历史的省思和观照，不仅会忽视所研究问题对象的历史，而且会忽视本学科的发展史。或可称之为“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世俗化，由此导致很少有人关注经济学专业学术和学科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对于“经世致用”中“用”的过度强调，则很容易沦入一种功利主